

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順 著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印  
度  
佛  
教  
思  
想  
史

印順  
著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印度佛教思想史 / 印順著. — 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3.10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18-4

I. ①印… II. ①印… III. ①佛教史—思想史—印度  
IV. ①B949.35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40956號

## 印度佛教思想史

著 者：印 順

責任編輯：廖 波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貴陽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12.5

字 數：290 千

版 次：2013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81126-618-4

定 價：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0851-5981027

本書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 2011 年、2012 年貴州省新聞出版局重點圖書，  
并獲貴州省出版發展專項資金資助

##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爲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爲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爲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爲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爲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并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爲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蘊。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想要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率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累累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 自序

一九六七年，我在《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自序”中說：在戰亂中所寫的《印度之佛教》，“是用文言寫的，多敘述而少引證，對佛教史來說，體裁是很不適合的，而且錯誤與空疏的也不少。……我要用語體的，引證的，重寫一部”。但直到現在，二十年的悠長歲月，《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以外，祇寫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如來藏之研究》、《空之探究》，晚年衰病，“重寫一部”——分爲多少冊的意願，已無法達成，所以三年前，將《印度之佛教》重印出版。《印度之佛教》的錯誤與空疏，在上面幾部寫作中，雖已做部分的改正與補充，但印度佛教演變的某些關鍵問題，沒有能做綜合聯貫的說明，總覺得心願未了。現在據我所理解到的，再扼要地表達出來。

“佛法”在流傳中，出現了“大乘佛法”，更演進而爲“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動力，是“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懷念，是通過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像的成分；離釋尊的時代越遠，想像的成分也越多，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實。

佛弟子對佛的懷念，起初是：釋尊遺體——舍利的建塔供養，釋尊遺迹的巡行，表示對釋尊的信敬與思慕。釋尊過去生中——菩薩的大行，也從“本生”、“譬喻”、“因緣”中流傳出來。佛及過去生中菩薩行的偉大，是因佛弟子的懷念釋尊而引發的，成爲佛教界

的共同信念。涅槃，涅槃了的釋尊，不是神教想像的“神”那樣的存在；但一般信眾，對於佛入涅槃而再見不到了，不免引起內心的悵惘。態度自由而重於理想的大眾系說：佛是不可思議的存在；佛壽是無量的；現在的十方世界，有佛出世：這多少滿足了一般人心——“大乘佛法”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現。

釋尊開示的正法，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修學者先徹了因果的必然性——如實知緣起；依緣起而知無常，無我無我所，實現究竟的解脫——涅槃寂滅。涅槃不落有無，不是意識語言所可表示，為修行而自覺自證知的。以菩薩大行為主的“初期大乘”經，繼承“佛法”的正法中心，但“佛法”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而“初期大乘”經，却是直顯深義——涅槃、空性、真如、法界等，都是涅槃的異名。所以，“佛法”從緣起入門，“初期大乘”是直顯諸法的本性寂滅。諸法本性是無二無別、無著無礙的，在“佛”的懷念中，傳出一切眾生有如來（胎）藏、我、自性清淨心的“後期大乘”經。這樣，“正法”由緣起論而發展為法法平等無礙的法（本）性論，又由法（本）性論而演化為佛性（如來藏）本具論；再進就是本來是佛了。這是佛教思想發展中，由法而佛的始終歷程。

佛法甚深——緣起甚深，涅槃更甚深，一般人是難以受學的。為了方便普化，施設“念佛，念法，念僧，念施，念戒，念天”——六念法門，使不幸的人，在恐怖、苦惱或病重時，能內心安定，不失善念，這有點近於一般宗教了。“念（憶念，繫念，觀念）佛”是特別發達的！大乘興起不久，犍陀羅、摩偷羅一帶，有塑造、繪畫的佛像流行。方便的“念佛”，過去是念佛的功德，現在也取（佛像）相而念佛的色身。一心繫念，佛於自心中現起；依據這種修驗，得出“自心作佛”，“三界唯心”的理論。後期的大乘經說：如來藏、我是相好莊嚴的，

自性清淨心是清淨光明的，衆生本具，所以念佛不祇是念三世十方佛，更要念（觀）自己是佛。“念佛”，是從“初期大乘”、“後期大乘”，進入“秘密大乘法”的通途。

菩薩發菩提心，久在生死修難行大行，精神偉大極了！但在一般人，可說嚮往有心而不免無力承擔的，於是繼承“佛法”的方便，說佛前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這是廣義的“念佛”，容易修行，爲養成大乘法器的方便。一般的“念佛”方便，着重稱名，有“消業障”、“生淨土”、“不退菩提”，種種的現生利益。西元前後，經典的書寫流行，爲了普及流通，經中極力稱揚讀、誦、書寫、供養經典有種種現生利益。般若“是一切咒王”，勝過一切神咒，也就承認了世間的神咒。以唱念字母，爲悟入無生的方便。大乘經的音聲佛事：唱字母、稱佛名、誦經、持咒，是“大乘法”能普及民間的方便。

“佛法”說到了“念天”，菩薩本生中，有以天、鬼、畜生身而修行的，“大乘法”也就出現了“天（大力鬼王、高等畜生）菩薩”。帝釋等每說陀羅尼——明咒護法，咒語漸漸重要起來。“後期大乘”的《楞伽經》等，進一步說：印度民間信仰的天，鬼神，古仙，都是佛的異名，佛所示現的，奠定了“佛天一如”的理論。西元三世紀起，印度梵文學復興，印度教也漸漸興起。在“大乘法”的方便道及如來果德的傾向，適應外在情勢，發展爲“秘密大乘法”，多與神（天）教相通。如教典不名爲“經”，而名怛特羅（續）。取“奧義書”式的秘密傳授，師長的地位重要起來。咒——佛、菩薩等的真言，是“語密”。神教的手印，佛法也有了，是“身密”。護摩——火供（“佛法”所禁止的），成爲自利利他的重要事業。民間信仰的鬼神進入“秘密大乘”的堂奧：有手執武器，忿怒相的天菩薩（或佛所示現）。濕婆天派有“性力”崇拜，“秘密大乘”也有相抱相合的（俗稱）歡喜佛。

適應與融攝神教，“佛天一如”的具體化，為“秘密大乘”的特色！

“大乘佛法”的菩薩大行太難了，一般傾向於重“信”的“易行道”。恰好如來藏是佛智與色相莊嚴的本來具足，與“念佛”的是心作佛、自心是佛相通，“秘密大乘”這纔觀自身是佛——“天慢”，發展為即身成佛的“易行乘”。即身成佛，不用修利濟衆生的菩薩大行，等成了佛再來利濟衆生。難行不用修，佛果可以速成，對一般人來說，真可說太好了！

大乘經中，十方世界的佛、菩薩多極了，再加入印度群神，不免雜亂。“秘密大乘”作了有組織的序列，如“瑜伽續”以中央毗盧遮那，及四方四佛，分五部（族）而統攝一切。五方五佛，是仿照忉利天帝釋在中央，四方來的四大天王四面坐的集會方式。帝釋是執金剛（杵）的夜叉；夜叉是一向分為五族的。夜叉王——執金剛，金剛手，金剛藏，普賢（坐六牙白象，與帝釋相同），是“秘密大乘”的當機者。忉利與四大王衆天，是欲界的地居天，天龍（鬼畜）八部的住處。欲界是有淫欲的，地居天形交成淫而不出精，正是“無上瑜伽續”，修天色身，貪欲為道的理想境界。太虛大師稱“秘密大乘”為“依天乘行果而趣佛果”，這是不以人事為本，適應印度神教，以天（鬼神）法為本的大乘。

以上是上乘經法的情形。分別抉擇經文，成為條理嚴密的義解（論義也影響後起的經典），是論。大乘論有：1. 中觀系。“初期大乘”的直顯深義，學者容易流入歧途，龍樹起來造論，說緣起無自性故空；以“佛法”的“中道、緣起”，貫通“大乘佛法”的“性空、唯（假）名”。龍樹說：“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那是回歸於“佛法”的立場，“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了。所以中觀是三乘不二的正觀，有貫通“佛法”與“初期大乘”的特長！2. 瑜伽行系。無著依（文體



近於論的)《解深密經》等造論：“初期大乘”的一切法空，是不了義說，緣起——依他起相是自相有的；“後期大乘”的如來藏、我，是真如的異名。瑜伽行系的特色，是依虛妄分別(的“分別自性緣起”)，說“唯識所現”。爲了論證唯識所現，陳那與法稱發展了量論與因明。說到轉染成淨，立佛的“三身”、“四智”；佛果是當時佛教界的重要論題。中觀與瑜伽行二系，都分別如實與方便，多少糾正了佛教界的偏差。不幸的是，後學者爲了龍樹說緣起無自性，無著說緣起自相有，彼此間引起無邊的論爭，忘失了佛法“無爭”的精神！

3. 如來藏系。如來藏、我、自性清淨心，近於神教的真我、真心，適應世俗而流行。堅慧的《究竟一乘寶性論》，受到無著論的影響，却没有說種子與唯識。論說四法：“佛界”是本有如來藏；“佛菩提”、“佛法”、“佛事業”，是如來藏離染所顯的佛體、佛德與佛的業用。有的學者，融攝瑜伽行派的“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使虛妄的阿賴耶——藏識，與如來相結合，說“如來藏藏識心”。以真常爲依止而說唯心，是文體近於論的《楞伽》與《密嚴》。《寶性論》明佛的因果體用，《密嚴經》說如來藏是念佛三昧者的境界，也就是觀自身本來是佛。後起的“秘密大乘”，攝取“中觀”與“瑜伽”，繼承“如來藏”說，從信仰、修行中發展完成。

印度佛教(學)思想史，一般都着重於論義。論是分別抉擇，高層次的理論，是不能普及一般的。“大乘佛法”後期，那爛陀寺的論學，成爲佛教權威，而重信仰、重他力、重事相、重修行、重現生利益的佛法，正以“念(佛天一如)佛”爲中心而普遍流行。晚年多讀經典，覺得適應信增上的方便，如造塔、造像、念佛、誦經……存在於佛教中的異方便，對佛法思想的演化有極爲深遠的影響，所以曾寫了《佛法方便之道》十餘萬字。又覺得：如實與方便，是相互影響